



江南名鎮志

蒲溪小志



[清] 顧傳金 輯 王孝儉 金九牛 陸益明 標點

閔行區區志辦公室 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江南名鎮志

蒲溪小志



[清] 顧傳金 輯 王孝儉 金九牛 陸益明 標點

閔行區區志辦公室 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蒲溪小志 / (清) 顧傳金輯; 閔行區區志辦公室整理.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 7
(江南名鎮志)
ISBN 7-5325-3452-9

I. 蒲... II. ①顧... ②閔... III. 鄉鎮—地方史—
上海市 IV. K295.1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3) 第 032006 號

江南名鎮志

蒲溪小志

[清]顧傳金 輯

王孝儉 金九牛 陸益明 標點

閔行區區志辦公室 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上海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望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4.5 插頁 10 字數 88,000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3452-9

K·481 定價: 14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62505187

前言

一

《蒲溪小志》是晚清七寶鎮人顧傳金輯著的一部七寶鎮志。七寶因鎮中有流貫東西之蒲匯塘而別稱蒲溪，輯著者以之為鎮志題名，即緣於此。

顧傳金，七寶北鎮白場人。嘉慶諸生。生平事跡不詳。《蒲溪小志》卷四「文集」錄有其所撰《安平橋始末記》，白署寫於道光十九年春，「時年六十有七」。按道光十九年即公元一八三九年，以此上推，顧氏應生於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。其卒年無考，但《小志》補記鎮事最晚一件為道光二十七年（一八四七）列女李倬雲獲贈「柏操松齡」匾，則顧傳金至少應活到七十五歲。民諺有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之嘆，顧氏在晚清當屬高壽者。

《蒲溪小志》全書五萬餘字，按方志體裁分卷設目記事。卷一列十二目，記述七寶名

義、建置沿革、形勝、疆域、水利、物產、風俗等人文地理情狀；卷二列六目，專述七寶政治、文化設施和人物傳記；卷三列七目，概述七寶名勝古跡、祥異、藝術諸事；卷四為詩文、碑記、遺事三目。凡四卷二十八目。雖分卷列目間有交叉，但舊志體例皆所具備，記事狀物簡而不繁，略古詳今條縷清晰，堪稱一鎮之全史。

《小志》成書後未見刊本，傳世者僅止抄本而已。七寶歷來文儒輩出，縉紳之家每視鄉土歷史文獻為勛勉子孫之要籍，故《小志》抄本衆多，已知有李氏、楊氏、甘氏、阮氏、潘氏諸種。晚清以還，七寶歷遭兵災，抄本大多隨兵火而燬，搜求不易。一九五九年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於鎮中耆舊處訪得李氏抄本，「既無序跋，又不載纂輯者姓氏」，經多方查訪，「始悉是書為顧傳金手輯」。一九六一年即據以排印，列為《上海史料叢編》之一種，內部發行，供研究上海地方史志者用。今刊本《蒲溪小志》即以此為底本，參以楊氏抄本點校，並附有照片、地圖，成為一種較為可靠完備之校勘本，也是《蒲溪小志》成書後第一次正式出版的七寶鎮志。

據金維鰲《盤龍鎮志》所記，與顧傳金同時代，同為嘉慶諸生之七寶鎮人陸元勳，著有《七寶鎮志》一卷。迄今未見流傳。《小志》卷四「藝文」中，對歷代七寶人之著述，收目甚詳，唯獨不見陸著《七寶鎮志》；卷二「列傳」雖有陸元勳傳記，但傳文中亦未提及陸著鎮志一事。故今刊本《蒲溪小志》點校者之一金九牛先生，有懷疑《小志》或即陸元勳《七寶

鎮志》之說。因疑而無據，故今刊本《蒲溪小志》仍署「顧傳金輯」。

今本《蒲溪小志》經校勘，知其約五分之三內容，係輯自明崇禎、清康熙與嘉慶各朝之《松江府志》及明萬曆、清乾隆之《青浦縣志》，間或亦有采自嘉慶《上海縣志》和乾隆《婁縣志》者；約五分之二為顧傳金訪探搜求鎮事後所補撰。補闕之年代，起自嘉慶六年（一八〇一）迄於道光二十七年（一八四七），約當顧氏三十歲以後之壯年與晚年時期。補闕之內容，包括建置沿革、水利、科貢、封贈、崇祀、人物傳記之大部。由此可見今刊本仍沿用上海市文管會內部排印本署「顧傳金輯」，似可商榷，應署「顧傳金輯著」或「顧傳金輯撰」較為相宜。如此，方可實至而名歸，以示顧氏輯錄補撰之功也。

二

《蒲溪小志》輯錄舊府、縣志中有關七寶鎮得名和建置的內容，又補以嘉、道年間七寶實際隸屬之區劃，對後人瞭解七寶歷史沿革，提供了可信的資料。

據《小志》所記，可知七寶是歷史悠久的千年古鎮，因七寶寺而得名。七寶寺又稱七寶教寺，初名福壽庵，為三國時東吳大將陸遜後裔陸機、陸雲之家祠，原在陸寶山，故俗稱

「陸寶庵」。五代十國時，遷至吳淞江邊。吳越王錢鏐應陸氏之請，來陸寶庵進香并賜以「金字藏經」，曰：「此亦一寶也。」陸寶庵遂改名「七寶寺」。後因江水噬岸，於宋初再遷於鎮上。鎮遂以取名焉（卷一「名義」；卷二「寺廟」）。

以陸寶庵而改稱七寶寺，變姓氏之陸為數字之七，以未名之小鎮，因寺而得名七寶，皆緣因於吳越王所賜之「金字藏經」。此經據傳係由吳越王妃用金粉手書，並以金粉蓮花戳印作為經文分段標記，亦稱「金字蓮花經」。是故，七寶民間歷來流傳七寶寺係「飛來」之寺，目其為傳說中七件寶物之一。其實，「飛來」為「妃來」之音轉，一字之訛，將真實之歷史異化為神話般之傳說了。「金字蓮花經」至今猶珍藏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，只是歷經千餘年已散佚不全，所藏僅殘經數頁耳！

歷史上的七寶，建置多變，區劃複雜，端賴顧氏詳為考求，始得釐清沿革。大體而言，七寶鎮在明代分屬於華亭、上海、青浦三縣。清代順治十二年（一六五六）分華亭縣之楓涇、胥浦二鄉及集賢、華亭、修竹、新江四鄉之半建婁縣，七寶改屬婁、上、青三縣。「而其分界以蒲匯塘為主，塘之南為婁縣，北為青浦，東二里許塘之北曰璆橋，其橋東即上海也。」（卷一「郡縣建置沿革」）以一鎮而分屬三縣，從一個側面說明七寶在明清兩代已是經濟發達、賦稅倚重之區了。因為封建王朝時代，析縣另立新縣，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多增田賦。松江府向為賦稅重出之地，即如《小志》所記，府屬之華亭縣，「田賦百萬，非一令所

能經理」，其分為華亭、婁縣二邑，正是為了朝廷能更有利於徵收。以此類推，則七寶分隸三縣，理當於斯。

七寶是個典型的江南水鄉，河道縱橫，橋梁卧波。鎮中有自西而東之蒲匯塘（亦稱蒲溪），為太湖水系之一，西受盤龍、泗涇、橫泖等水，東流過沙、竹岡、橫瀝諸水，匯注於龍華港而入於黃浦。蒲匯塘在明代時闊一十四丈（約合四十六·二米），深二丈，是全鎮的幹流，也是七寶的「母親河」。鎮左有南北向之橫瀝塘（一名橫灤、橫涇），北接吳淞江，南連黃浦江。其餘支河十餘條，前明時一例深通。如今，蒲匯塘雖在，但早已既狹且淺，橫瀝北段被填，僅存南橫瀝一段；支河則大多變為農田，水鄉徒有其名。後人只能在展讀《小志》時，才得以遙想當年七寶的生態環境。百餘年間的滄桑變遷，真令人感慨不盡！

橋梁是構成水鄉的獨特風景。《小志》記嘉道以前七寶四周共有橋二十一座，若加上西通泗涇之沿途九橋，則有三十座之多。真可謂櫓歌聲聲，橋影幢幢，無怪歷代文人墨客為之心曠神怡，誦唱不絕。《小志》卷二「詩文」中收錄了不少詠嘆七寶的詩作，大多為七寶水鄉風情所引發。在眾多石橋中，以蒲匯塘橋最雄偉。據《小志》記載，此橋於明正德十三年（一五一八）由鎮人徐壽、張勳捐資倡建。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重修。橋存三拱，主拱跨度十一·二五米，高五·二米。二拱跨度均五·六米，高三米。橋長二十九米，南北各二十級，橋寬五·四五米，兩旁設石欄。按《小志》卷一

「水利」稱，蒲匯塘在「明天順二年（一四五八）時闊十四丈」（約合四十六・二米），至同治初蒲匯塘橋重修時，橋長僅二十九米，四百餘年間，蒲匯塘淤塞變窄幾近一半。嗟嘆之餘，不由令人懷疑蒲匯塘橋初建時，究竟三孔抑是五孔？因為自天順二年到正德十三年，相距僅六十年，以常理度之，半個世紀內，決不會淤塞如此嚴重。所以近人認為橋有五孔之說，當非空穴來風。證之《小志》，未記橋有幾拱，是否顧氏亦有此疑，良未可知也。以目前上海市四郊而言，有此五百餘年之古橋遺存者已不多見，故蒲匯塘橋於一九六三年被列為上海縣縣級文物保護單位。二〇〇一年經人修，雖秀色重增，然與古橋之質樸厚重異趣矣！

三

地方志向有記一方盛衰之傳統。《蒲溪小志》篇幅不大，行文簡賅，但記七寶興衰却不吝筆墨，述其原因尤重事實，頗合「史家法度」。

七寶在明清兩代之興衰，全緣因於水利水運之功能。《小志》稱：「吾鎮居蒲匯塘、橫瀝之間，凡舟楫往來，商賈貿易，田間灌溉，皆於水是賴。惟水利修則商賈集，而田事舉。」（卷二「水利」）清代以前，七寶河道深闊，水運便捷，成為「商賈必由之地」，商業因此

繁盛。《小志》具體記述了七寶的商業布局：七寶鎮市集中於蒲匯塘南北兩大街，「南鎮白蒲匯塘橋南塊柵樓起至南盡處，曰南大街，商賈貿易，悉開店肆，約長二百步有零」；「北鎮自蒲匯塘橋北塊柵樓起至北柵鎮安橋止，曰北大街，悉開店鋪，生意貿易之處約長三百步」。此外，沿蒲匯塘兩岸有南東、南西、北來、北西四條街鋪，亦有店肆之設（卷一「街衢」）。由於商業興旺，故舊青浦志稱七寶「居民繁庶，商賈駢集，文儒輩出，蓋邑之巨鎮云」。

紡織業是古代七寶一大經濟支柱。明清兩代，七寶隸松江府，為府屬中重要之棉花、土布集散地。在這方面，《小志》為後人保存了不少資料。《小志》稱：七寶四鄉「大熟所種，花居大半，豆次之，種稻者十不得一」（卷一「風俗」）；「所種者皆白色，以供紡織，且資遠販，公私賴之」（卷一「物產」）。七寶所產之手工織布，有標布、扣布、稀布三種。標布又稱寸布，上闊而下尖，僅七寸、九寸；扣布又稱小布，密而狹；稀布則疏而闊。其中以稀布最有名，人稱「七寶稀」，也稱「七寶尖」。時人有文曰：「布之精者為尖，有龍華尖、七寶尖名目。」（清張春華《滬城歲時衢歌》）四鄉農民「比戶織作，晝夜不輟，鄉鎮皆為之。暮成疋布，易錢米以資日用」（卷一「風俗」）。又曰：「俗務紡織，清晨抱布入市，易花、米以歸，來旦復抱布出。織布者率日成一疋，其精敏者日可二疋。田家收穫輸官償租外，未卒歲而室已空，其衣食全賴此以出。」（同上）中國社會之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生活狀況，

由此可見一斑。

由於棉紡織業發展，七寶形成了一條專業製作木紡車售賣的商業街，名曰「紡車街」。街在南鎮自東柵至安平橋，「長約三百餘步」，較主要商業區之一的南大街猶過之，足見七寶紡織業之盛。《小志》以上内容，為後人研究松江府「衣被甲天下」的棉業和棉紡織業集散網絡，提供了重要的個案資料。

商業繁榮，勢必促進文化發展。古代七寶，人才輩出，人文薈萃。《小志》所記，明清兩代，尤其是明代，七寶「科甲蟬聯不絕」，先後出了六名進士、十六名舉人、八名明經、二名武舉。其中，進士及第者大多官至一省的布政使，正、副按察使，明經者則多為州、縣學正、訓導、教諭，舉人中不少在中央部院任主事、員外郎等職。故《小志》有「吾鎮在前明人材輩出，科第蟬聯不絕」，「名臣大儒，布滿朝野」之說（卷二「科貢」；卷二「形勝」）。至於能詩善畫、名醫巧匠，更代不乏人，《小志》輯錄者多達十六人。元代著名書法家、翰林學士趙孟頫（子昂），著名詩人楊維禎（廉夫），清初曾人武英殿註唐詩、纂修詞譜的學者樓儼（敬思）等人，或來七寶以詩畫會友，或結廬僑寓於鎮。他們的事跡與留下的眾多詩文，都被顧氏搜輯於《小志》內，對後人研究元明清時代江南士大夫的文化心態、生活情趣、行止交遊，都不失為可資採擇的資料。

自清代中葉起，七寶曾一度衰落。對此，顧氏既有所觀察，且不無感嘆。他在卷一

「形勝」中寫道：「七寶前臨蒲匯塘，左有橫瀝，後有寺浜環抱，西接九峰之秀，東通大海之潮。其餘支河約有十餘條，在前明一例深通。故終明之世，科甲不絕，名臣大儒，佈滿朝野。自入國朝以來，蒲匯大塘猶且通塞無常，而一切支河、小港間橋樑雖存，盡為平陸，不特科第乏人，即居民亦不免蕭索矣。」

有此感慨，顧氏在《小志》卷一「水利」中，輯錄并補撰了自南宋淳熙二年（一一七五）至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六）共六百六十一年間先後二十六次疏濬蒲匯塘的史實。其中，清代以前八次，清代十七次。清代中尤詳於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，既列次數（十一次），又詳述河工情況，具體展示蒲匯塘由暢至淤的原因及經過。據此可知，乾隆朝以前，蒲匯塘雖有淤塞，但并不嚴重。故《小志》稱：「自嘉慶以前，官司嚴肅，胥吏不敢公行作弊，故河道深闊。雖當開濬之期，猶能舟楫流通。」嘉慶朝起，胥吏貪賄，主事者玩忽因循，河道旋濬旋塞。其中最留後患的是嘉慶六年（一八〇一）署松江知府康基田疏濬蒲匯塘。康身為河工主官，却寄寓於七寶教寺僧舍，種竹賞景，擇地葬佛，對河工不聞不問，「遂使河身淺狹。以後開挑，以為河身本如是，而旋開旋塞也」。

顧氏將七寶興衰原因歸之為水利興廢，在農業社會時代，確屬不刊之論。古代中國城鎮，大多倚水而建，既利農事，又便於商賈往來。水利興廢，歷來是城鎮興衰的直接動因。七寶在前明之所以成為松江府屬中經濟、文化發達之重鎮，蓋得益於河道暢通之利。清中

葉起，水利失修，河道淤塞，農事商業俱受損害，則其衰敝是所難免也。

四

《蒲溪小志》雖屬一鎮之全史，但仍有不少資料可以小中見大，反映全國的歷史脈搏。例如：

關於河工之運作情況：河工是封建王朝四大政之一，關係國計民生的悠悠大事。歷代史籍雖多有記載，但如何運作，往往語焉不詳，常令研究者為之束手。《蒲溪小志》卷一「水利」，輯錄舊志中康熙十七年（一六七八）《郡人張錫懌開河條例》、乾隆二十年（一七五五）《青浦知縣魏永安荒圖免派濬蒲匯塘碑記》，并補撰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開濬中地方董事支應上級委員需費情況，及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六）上海知縣黃冕開濬蒲匯塘時廉潔奉公、辛勞勤業之事例。這些，均可為治史者研究河工各項運作環節與則例提供第一手資料，從中亦可窺見胥吏侵吞及實際用於治河經費之大概比例。此類資料，一般正史及官修方志大多付闕，唯有私家纂修之鄉鎮志因無忌諱而往往據實纂錄。則鄉鎮志之「存史」功能，當不可小視。

《小志》卷二「水利」，還收錄道光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（一八三六年七月初八日）時

任江蘇巡撫林則徐於該年濬畢蒲匯塘後，循鎮民之請永留攔潮大壩，以防黃浦江泥沙經龍華港內灌之稟詞批文。林氏批文，體現其關心民瘼、注重河工之經世致用一貫吏風。經查，由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、研究室編，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出版的《林則徐集》，其中《公牘》一冊，缺道光十六年各類公牘，則《小志》所錄該年之林則徐批文，恰可拾遺補缺。

關於清代禁煙。《小志》卷一「風俗」稱：「為地方之害，其禍更烈者，莫如吸食鴉片煙。不肖子弟食之，往往始而傾家，終為竊賊。辛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題奏，奉旨嚴禁，此風庶可熄矣。」以七寶僻居東南海隅之農村集鎮而咸知黃爵滋倡禁鴉片之摺，不僅從中可見嚴禁鴉片疏影響之大，而且可知嚴禁一事并非純屬具文。在煙毒泛濫、為害鉅烈時，嚴禁之舉，正合四民之望。

關於天主教之流佈。顧氏稱：「吾鎮有最可笑而最可耻者，曰天主教。閱其書，大不通之至。愚夫愚婦奉之，謂其愚昧無知，猶可諒也。乃若自以為昂昂丈夫，或身列膠庠，或身人成均，猶然男女混雜、不顧廉耻，卑躬屈膝，尊禮不衰，深為可嘆。」（卷一「風俗」）西方天主教在中國流佈，是中西關係史上大事之一。據新編《上海縣志》（王孝儉主編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）考證，早在清康熙年間，七寶塘灣（今七寶鎮紅明村顧家塘）地區已有不少會口，是江南天主教主要活動地點之一。後於塘灣設修院。道光二十七年

(一八四七)塘灣堂與徐家匯堂合併，三十年兩堂分為兩區。咸豐六年(一八五六)塘灣堂改稱七寶區，屬松江總鐸區。同治六年(一八六七)，七寶天主堂建成，天主教活動中心由塘灣移至七寶(見該書第一一〇七頁)。如以《蒲溪小志》補記鎮事之最晚一年為道光二十七年計，可知當時天主教已深入七寶鄉鎮，而入教者中除鄉鎮居民外，士林中人亦復不少。顧氏對此頗多非議，足見一部分士紳排斥西方宗教之文化心態。

關於服飾之僭越，亦多有看法。封建王朝時代，四民服飾，皆有定制。清代乾嘉以後，由於商貿發達，俗尚奢華，服飾往往踰制而不以為非。成書於道光末葉之《蒲溪小志》，生動記敘了當時七寶服飾踰制情狀：「俗尚驕奢，婚嫁宴會率尚靡麗。殷實之家華於服飾，轉輾沿習，小戶效之，往往有鄉村農婦，簪必金瑱，衣必錦繡。時當嫁娶，笙歌細樂，讌飲累日。問其職不過一生監，而於婚娶之時，鳴金開道，甚至白丁而有錢者亦如之。則奢也而近於僭也，不特可笑，抑亦可耻之甚也。」此條雖記婚娶之奢麗，但從中可見服飾變易已成時尚，或可為研究社會史者之一例。

其他如「巫固不禁」、「花鼓戲」、「賭博」、「鬥蟋蟀」、「把鵪鶉」等，亦可以一鎮之風俗，反映明清兩代松、青地區社會生活奢靡之情狀。

據我私見，《蒲溪小志》在記述七寶風俗時，往往寓「資治」於「教化」之中。顧氏在訓誡子弟避惡從善、辟邪崇正之餘，常就世風國運微作諷嘆，此一特點，在「形勝」、「水利」、

「寺廟」、「科貢」等目之破題及志文中，每有所見。竊以為《小志》並非僅是述而不作之書，而是在「存史」、「資治」、「教化」功能中，寄寓着一個普通鄉紳對封建末世社會衰敗的感慨和期盼「治世」的理想追求。這雖非方志固有之傳統，却是私家修志常見之特色。

五

我國是方志纂修大國。據統計，存世之各種地方志書約八千餘種，數量之多，世罕其匹。自東漢迄於民國，歷史悠久，源遠流長。大體而言，可以南宋為界。之前，為方志成型之蛻變期，多以地志、地記、圖志、圖經等名目與形式傳世。之後，為方志定型期，體例完備，統合古今，成一方之全史。元、明兩代，修志成風，官府、士林皆所側目。至清，則自省府州縣外，並鄉、鎮亦多用志，開歷代未有之記錄。（朱士嘉《中國地方志綜錄》增訂本序言）《蒲溪小志》即是晚清鄉鎮志人盛時之產物。

清代編纂之鄉鎮志，迫於種種原因，大多未能刊印行世，或雖有刊本，但流傳甚少，給研究者帶來很多不便。鄉鎮作為城市與農村的中介，在城市近代化過程中具有特殊意義。要說明城市經濟的發展，不研究鎮市的經濟功能，就難以理解農村經濟與市場的關係，要闡述都市文化的輻射與影響，不研究市鎮文化對鄉村的作用，就很難解釋都市文化的效應。

和張力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傳統農業社會的變遷史本質上就是鄉鎮社會的發展史。所以城市史研究，不應只停留於城市市區的研究，必須拓展到作為城市和農村之中介的集鎮研究，這樣才能更好地闡明城市近代化的深度與力度。尤其在當代城鄉一體化的建設中，發掘鄉鎮的歷史文化特點，對加速鄉鎮的城市化進程、正確處理城鄉關係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。

有鑒於此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正忙着總纂《上海通志》的王孝儉先生之建議下，決定編印《江南名鎮志》叢書。這真是一種嘉惠當今、造福後世的大好事。相信隨着這套叢書的陸續問世，將對方志學研究的深入，對上海史研究的發展，對城鄉一體化建設，都會帶來積極、深遠的影響。

《蒲溪小志》作為這套叢書之一種，得以出版，這對九泉之下的輯著者，應是最好的告慰。七寶在改革開放時代的飛速發展經歷，證明了必須具有本鄉本土深厚的人文歷史土壤，才能在二十一世紀新一輪的機遇中更快騰飛。就此而言，《蒲溪小志》的正式出版，確屬可喜可賀之事！

沈渭濱

二〇〇二年一月定稿於蒲溪抱墨軒